

決不容許右派分子誣蔑我們的古書保護工作

王 鴻

在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有些右派分子也向我們的古書保護工作，放出了他們的毒箭。有人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視珍寶如廢物的人們’”；也有人說：“圖書館事業存在着極其嚴重的危機……解放以來，可以說古書不斷地毀壞散亡，任其糜爛”。甚至還有人說：“現在對圖書的破壞等於秦始皇的焚書”。他們故意掩蓋了解放以前，古書所遭到的種種破壞和帝國主義肆意地大量搶劫的事實，卻顛倒黑白地抹殺了解放以來，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努力搶救和保護古書所獲得的重大成績。這是我們所有圖書館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古書保護工作者堅決不能容許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祖國擁有悠久的、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遺產。古書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近百年來，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的勾結下，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的方法，大量搶劫我國珍貴的古書和古代文物。眾所周知，舉世聞名的世界歷史文化的瑰寶——唐代的“敦煌文物”（包括寫本古書和古藝術品）在發現以後不久，就被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美國的華爾納等一羣帝國主義的強盜和騙子，把大部分精華先後掠奪去了。在五百多年以前編成的最珍貴的文献之一“永樂大典”的剩餘八百餘冊，在1900年也被帝國主義強盜——“八國聯軍”搶掠破壞。據不完全的估計，永樂大典先後被帝國主義者搶走或高價掠奪的，至少在150冊以上。在美國有46冊，在英國有30多冊，在日本有50多冊，在西德等處也有一些。而保存於北京圖書館的不過只有207冊。至於其他的宋元以來珍貴的刻本、寫本，被帝國主義連搶帶騙盜運出國或高價掠奪的就更多了。僅僅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慕思德東方圖書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六個圖書館中，就收藏着我國的善本圖書有三千多種！此外，美國各個圖書館所攫取去的中國地方志有四、五千種，“家譜”近兩千種，還有數量極大的近百年來的史料。其他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所攫奪的也很多。

此外，已經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古書，甚至也不能幸免。北京圖書館，在抗戰以前幾十年來所收集的善本的精華，不是有兩萬多冊至今尚“扣押”在美國，還不能回到我們祖國的懷抱嗎？南京圖書館（前為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在南京解放前夕，不是幾乎全部被國民黨反動派用軍艦劫往海外去了嗎？

談起這些我們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被任意破壞、搶劫的經過，真是令人十分痛心和無比憤怒！可是，當時的反動統治者不但從來沒有設法制止，而且，他們自己就是破壞、搶劫的凶犯和幫凶！

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恰恰和過去的反動統治者相反，從來就是尊重和堅決保護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遠在抗日戰爭中的1942年，為了搶救收藏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的金刻大藏經（即“趙城藏”，共四千多卷），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八路軍，曾經和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有幾位戰士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而“趙城藏”終於被救出來了。解放以後，保存在北京圖書館，成為我國哲學史上尤其是印刷術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

全國解放以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工作更得到了廣泛的開展。在1950年5月，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就發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的法令，首先對帝國主義分子和不法奸商盜運古書出口的罪惡行為，給予了致命的打擊。並且，在我國的各個海關、口岸、邊防站和各種企圖盜運的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從而結束了百年以來，我國珍貴文物圖書被肆意盜劫的痛心的歷史。在保護我國文化遺產——古書的戰線上，取得了空前的偉大勝利！

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歷史上多年沿襲下來的，用古旧圖書做紙漿原料、包雜貨、做爆竹等等破壞古書的現象，也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在1950年發布前一法令的同時，前政務院還發布了“為規定古迹、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的法令。並且，在當時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為了及時加強圖書、文物的保護工作，前政務院在1950年7月還發布指示：“將有關保護文物圖書的法令作為

學習土改法令的參考文件。”接着1951年12月，文化部和輕工業部聯合發布了“關於禁止用舊板書做紙漿材料的指示”。1956年9月，文化部和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又聯合發布了“加強保護文物工作的通知”（其中包括對古舊圖書的保護工作）。根據這一系列的法令，各級文化主管部門和各地的文物保管委員會、圖書館、古舊書業和供銷合作社、造紙廠等有關單位，都先後組織人力，進行了從廢紙堆中搶救、保護古舊圖書的工作。在上海，僅僅今年上半年，這樣搶救出來的古舊圖書就有十四萬多冊；去年在從浙江運來的一批廢紙中也曾搶救出一萬多冊。在這些搶救出來的書里，有國內只有“天一閣”的唯一殘本明萬曆刻本陽守仁纂修的“嚴州府志”，有國內各藏書家目錄中未見著錄的明刻本饒安鄧志謨撰的“山水爭奇”。（其中有不少精美的版畫）還有明萬曆刻本“李卓吾評龍溪疏鈔”，明萬曆刻本“馮元成北征續刻”等等珍貴的善本。在廣東，1954年就曾經由文化局組織該省圖書館的幹部，在省內各縣搜集、整理了四十萬冊圖書，其中重要的就有二萬五千多冊。1956年在各縣又搜集到圖書資料四萬多件。其中有明成化本“貞觀政要”，清順治吳顯修的“潮州府志”等罕見善本和十幾種未刊稿本，並且還搜集到了1929年“紅四軍進軍潮汕時的布告”、國民黨南昌行營在1932年至1934年間收集的我中央蘇區各種革命文獻的彙編，以及抗日戰爭時期，“東江縱隊”的刊物。在安徽，不但曾經從廢紙中搶救出來了明萬曆刻本的“余象斗列國志傳”，明刻“楚辭”，而且，今年在文化部派趙萬里先生等去皖南訪書的時候，更搜集到我國最古的一部“董西廂”（八卷，海陽適適子的校梓）。這對我國金元文學的研究有很大的價值。廣西省第一圖書館也從廢紙中找到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其中有太平天國革命前夕，滿清政府企圖撲滅革命火焰的“鄉約條規”，有辛亥革命以前，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刊物“軍國指南”和“南風報”等少見的近代資料。

此外，在四川、江西、福建、湖北、陝西、山東等省的圖書館和文物保管委員會，也都進行了許多搶救古舊圖書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成績，不勝列舉。

各地古舊書業和新華書店，對於搶救、保護古書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北京的舊書業中，自從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先後派出了許多工作人

員，深入到江、浙、川、閩等許多省分，發掘和搜集了許多重要的珍本古書。如宋刻“五臣文選”、元刻勤有堂“國朝名臣事略”以及明萬曆刻本“順天府志”等等，還發現了許多重要革命史料，如1926年出版的“中國農民”，上面刊載着毛主席的“中國各階層的分析”、“海豐農民運動報告”、“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錄”。此外，上海、南京、廣州、武漢、洛陽等地的新華書店或古書店對搜集保護古書也有不少貢獻。

如果，從解放以來，各圖書館所搜集、入藏的的古書來看，那就更顯著了，許多省市圖書館所入藏的，已不是幾千、幾萬冊，而是幾十萬冊，甚至過百萬冊。就是以其中的善本書來看也是驚人的。北京圖書館在解放以前三十八年中，共入藏了八萬多冊善本書，而解放以來已增加到十六萬冊以上。解放後八年來的入藏已相當解放前的三十八年！

以上種種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自從全國解放以來，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我們為了保護古書，曾經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已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不但結束了百年來我國珍貴圖書被任意盜劫的歷史，而且，在各地即將損毀的“廢紙”中搶救出來了大量的珍貴古書和有用的資料。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決不是幾個右派分子所能够一筆抹殺的。

當然，八年來我們雖然取得了以上所述的重重大成績，但並不是說我們保護古書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完善。相反地，我們應當承認，破壞古書的現象還是不時發生。可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現象是從歷史上多年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形成的，絕不是如右派分子們所說是“解放以來”才發生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古書除了流散在比較集中的地區以外，還流散在大小城鎮和農村的民間各個角落，因而受到破壞的機會非常之多，要做到徹底的全面的保護，並不是短期內所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這種破壞縮小到最小的限度。因此，過去曾經有不少熱心於保護古書的同志，提出了加強保護古書的呼籲，以促進這方面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這是完全必要和值得歡迎的。但是，這和目前右派分子利用這些現象，向黨和社會主義進行惡意的誣蔑、攻擊却根本沒有絲毫共同之處。